

文学理论与  
文学研究系列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THEORIE DES MODERNEN DRAMAS

# 现代戏剧理论

(1880—1950)

〔德〕彼得·斯丛狄 著  
王建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现代戏剧理论

(1880—1950)

[德]彼得·斯丛狄 著

王 建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6—21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德)斯丛狄(Szondi, p.)著;王建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未名译库: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系列)

ISBN 7-301-10537-1

I. 现… II. ①斯… ②王… III. ①戏剧—艺术理论—研究—欧洲  
②戏剧—艺术理论—研究—北美洲 IV. J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307 号

Peter Szondi

Theorie des modernen Dramas (1880—1950)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65

书 名: 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

著作责任者: [德]彼得·斯丛狄著 王 建译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537-1/I·07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mailto: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5.625 印张 13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



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 译者序

# 从一本小书看文论的转折

——试析彼得·斯丛狄和他的戏剧理论

一本薄薄的小书，不到二百页的篇幅，没有太多的脚注和参考文献，第一次见到它时我很难相信这就是那本闻名已久的文学理论著作。1956年问世之时，它就因为与当时的学院式风格迥然不同，让人惊讶不已，一直以来对这本著作好评如潮，它被列为文学理论领域的必读书目。正是这本书使当时不满三十岁的作者斯丛狄(Peter Szondi)一举成名，不到三年就印了第二版，1963年的第三次修订版被收入德国著名的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简装书系列，当年就售出一万册。到今天为止这本书已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在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为止的国内文学理论研究中，斯丛狄只是在一些与他相关的上下文甚至只是脚注中被提到，而且由于名字奇特，出现了不同的中文译法。鉴于这是第一次将斯丛狄及其代表作介绍到中国，所以打算先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他的生平；然后将他放到当时德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背景中去，确定他的位置；接下来着手分析这本书的特点，探讨斯丛狄的理论的得与失；最后说说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系列考虑。

斯丛狄的一生跌宕起伏，不像通常的书斋学者，没有他们生

活中的那份安宁和平稳。斯丛狄这个名字就已透露出他的身世，他1929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莱奥波德·斯丛狄(Leopold Szondi)是从事深层心理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提出了立足于家族无意识和遗传取向的命运分析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虽然是纳粹德国的盟友，但是匈牙利的犹太人也未能逃过纳粹德国的迫害，从1941年起，斯丛狄就读的中学就将犹太人的入学比例限制在12%以下，斯丛狄的父亲失去了教授职位和医生资格。1944年3月19日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斯丛狄一家被迫带上了犹太人的标记，被赶出他们的住宅。1944年6月30日，斯丛狄全家和许多匈牙利犹太人一样，被押上专门运送犹太人的火车，前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每节原本拉牲畜的车厢中被塞进七八十人，路上几经波折，直到7月8日才到达目的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位于德国汉诺威附近，1943年7月建立，部分为战俘营，部分为犹太人转运营。设计容量为一万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关押人数达四万一千人。这个集中营虽然没有毒气室，但是约有三万七千人死于饥饿、疾病、过度劳累以及肮脏的生活环境。著名的《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就是被关押在这里，直至1945年3月病死。幸运的是斯丛狄一家虽然在集中营中历经苦难，被折磨得瘦骨嶙峋，但是当年12月3日他们得以离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于7日抵达瑞士，被收容营接纳。他们一家能逃过纳粹的大屠杀，成为匈牙利犹太人中的幸运者，这要归功于著名的卡斯特纳行动(Kasztner-Aktion)。当时匈牙利犹太组织的首领、犹太复国主义者鲁道夫·卡斯特纳(Rudolf Kasztner)与纳粹党卫军的艾希曼达成协议，以提供物资为代价赎买一千六百八十四名犹太人，斯丛狄的父亲由于属于学术名流而得以列

入这一行列。他们到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后就住在单独的“匈牙利营”中，然后分两批于1944年8月和12月被送往瑞士。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交易，后来导致卡斯特纳在以色列遭到起诉，乃至1957年他被暗杀，这就是当时他已知道等待着近五十万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是什么，但是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他保持了沉默，也就是说拯救这一千六百八十四人是以近五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当然，即便他当时透露了这一秘密，可能也难以挽救近五十万人的命运，不过对这些被拯救的幸存者来说，生命或许因此有了不可承受之重。斯丛狄后来的长期抑郁，乃至最后的自杀或许就与此有关。<sup>①</sup>

斯丛狄在苏黎世完成中学学业后于1948年冬到苏黎世大学攻读德语语言文学，在著名文学理论家埃米尔·施塔格尔(Emil Staiger)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54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博士答辩，后将博士论文补充和扩展后出版，这就是《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1959年他移居当时的西柏林，1961年获得教授资格，成为二战之后在德国完成教授资格论文的第一批犹太人中的一位，随后任教于柏林自由大学，担任编外讲师。一路顺风的他在申请教授职位的过程中稍稍遇到一些坎坷。1964年阿多诺正在法兰克福大学执掌社会研究所，刚刚将哈贝马斯从海德堡招到麾下，当时的社会研究所和德语语言文学专业一样属于哲学系，阿多诺在整个哲学系也是影响极大的人物。这一年7月，阿多诺推荐斯丛狄申请法兰克福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授职位，但是求职申请被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授驳回。这桩求职事件常常被看作保守的德语语言文学阵营对犹

---

<sup>①</sup> 本文关于斯丛狄的生平主要参考 Christoph König, Engführungen. Peter Szondi und die Literatur. Marbacher Magazin. Marbach am Neckar 2005 的年谱部分。

大学者的排斥,还将这一反犹传统一直追溯到1925年瓦尔特·本雅明申请教授职位遭拒的经历。有关斯丛狄的公案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定论,2005年7月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汇报》的副刊编辑耶格尔(Lorenz Jäger)之间爆发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正是斯丛狄的这次申请。耶格尔认为这个所谓反犹事件的传说该结束了,斯丛狄被拒绝只是由于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授愤于阿多诺的霸道,总想将自己的势力伸入德语语言文学专业,<sup>①</sup>而哈贝马斯则抨击耶格尔的一贯右倾倾向,指出联邦德国早期有许多大学教授有纳粹污点,当时的激烈反对者布格尔(Heinz Otto Burger)教授就是如此,当时的应聘者施维尔特(Hans Schwerte)后来被揭露出曾是党卫军的军官。<sup>②</sup>

虽然在法兰克福大学求职未成,不过斯丛狄很快就在1965年4月被柏林自由大学聘为教授,并由他主持建立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这个专业的建立在当时看来是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尝试,它注重的不是国别文学研究或者国别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而是承袭了韦勒克(René Wellek)在耶鲁大学的做法,强调从跨国别的文学理论出发展开研究。另外也有推测认为,聘请斯丛狄作为该专业的创立者或许别有含义,也许是因为德语语言文学研究在纳粹时期曾经扮演过不太光彩的角色,学校打算通过建立这一机构来与之划清界限。根据当时的学生、著名学者马特恩克洛特(Gert Mattenklott)的回忆,这个专业里的气氛是自由和宽容的,仿佛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或者也可以说是犹太学校,各种意见的自由表达和争论是这里的基调。斯丛狄不

① Lorenz Jäger, Ende Legend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06.07.2005.

② Jürgen Habermas, In unverkennbarer aggressiver Tonlag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3.07.2005.

是保姆式地指导学生，他反对用各种规章制度将学生管得毫无自由，而是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和自主性。但是他在强调学生的自由的同时对自己要求极严，对备课、考试和批改作业都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尤其有名的是他的教案，他课上要讲的每句话都写在教案之中，甚至包括所谓的即兴发挥。一份教案常常是以“女士们、先生们”开头，以“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下周再继续讲”结尾。<sup>①</sup>当年的学生，著名学者赖希尔特(Klaus Reichert)还记得斯丛狄身材十分高大，可是讲课的声音却很柔和，几乎难以听到，不过语气很坚定，不容反驳。看得出来他更愿意埋头于书案，而不是在课堂讲课。他开设了关于黑格尔美学的课程，每周要读二百页原著，然后由一个学生来做课堂报告，接着他会问道“你们对此有何看法？”接下来常常是一片静默，而他似乎也无力迅速结束这一冷场。显然沉默内向的他不是那种很会讲课的教师，但是他却用自己的风格感染和影响学生，他身上似乎总是笼罩着一种氛围，显示着他的学识和权威。<sup>②</sup>他的同事在他身上感觉到的是学术上的高傲，他眼界甚高，对当时活跃在报纸杂志上的文学批评家不屑一顾，曾列出过一个他认为理想的编辑部名单，组成人员大多是他所喜欢的知名作家。<sup>③</sup>在与同事的通信中，他毫不否认自己的“清教徒”和“精英”色彩，认为精英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他坚决否认自己信仰“善的专制”，他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sup>④</sup>

---

① Gert Mattenklott, Peter Szondi-Bei Gelegenheit einer Ausgabe von Briefen. 发表在柏林自由大学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的网页 <http://www.complit.fu-berlin.de/institut/institutsgeschichte/institutsgeschichte.html#Briefe>

② Klaus Reichert, Zum Bild Szondis. In: Neue Züricher Zeitung 27.07.2005.

③ Peter Szondi, Briefe. Frankfurt am Main 1993, p. 148.

④ Ibid., p. 344.

斯丛狄不是书斋式的学者，书房虽然是他工作的场所，但是在书房里可以看到的只是一幅本雅明的照片，还有少许正在使用的书籍，斯丛狄似乎从未着意于丰富的藏书，从未埋头做一个皓首穷经的读书人，他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文学人，积极参加柏林的文学生活，在各类文学活动中常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同时他将自己看作一个政治人，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60年代末的联邦德国正是政治形势风云变幻的时期，斯丛狄通过声明、公开信、论坛，甚至读者来信这种短小精悍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论当时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德国的犹太人和新的反犹主义、科学家的责任和面临的诱惑、审美的道德和政治的审美化等等。作为大学教师他还关注大学问题，当时的大学日渐成为各派观点激烈交锋的场所，他主张大学应该摆脱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纠缠，成为自由思想的场所。

不过斯丛狄的立场属于温和的左翼，在当时介于两大冲突阵营之间，尤其在60年代末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这种中间立场更加明显。早在1967年7月18日给他的老师施塔格尔的信里他就写道：“归根结底，德国的民主既不是受到政府的威权倾向，也不是受到某些圈子（比如几百个柏林大学生）的无政府倾向的威胁，威胁首先在于民主在这里依旧还是一个口号，而不是像在瑞士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生活。”<sup>①</sup>这一中间立场并不意味着躲避政治，他并不认同当时柏林自由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他们用小范围的纯学术讨论来回避政治的论争，他认为“人道的概念不能替代社会的民主化”，<sup>②</sup>但是当时学生运动的道路使他感到颇为失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否认自己认同“善的专制”。

① Peter Szondi, Briefe. Frankfurt am Main 1993, p. 228.

② Ibid., p. 283.

在大学改革方面斯丛狄支持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但是学生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左翼激进学生的立场,很快超出了他的想象,使他无法认同左翼阵营的主张。

被夹在对立的阵营之间,这种孤独寂寞,乃至无家可归的感觉对斯丛狄来说并不陌生,它在斯丛狄的一生中始终伴随着他。他作为一个在匈牙利出生的犹太人,躲过纳粹的迫害,在瑞士长大,然后又选择到德国生活和工作,自我认同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最明显的是语言的认同,儿时的匈牙利语虽然是母语,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快就忘却了,德语这门外语却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语言。他的学生马特恩克洛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斯丛狄指导他写博士论文时常常带着杜登字典和语法书,不厌其烦地纠正他的词法和句法问题。<sup>①</sup> 不过语言只是时时提醒他的一个标志,更重要的是身份的认同,作为无国籍的难民,斯丛狄一直到50年代还没有护照,不能离开瑞士。即便后来解决了护照问题,但是内心的认同却远不是一张纸可以解决的。他像很多受过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终生处在这一认同的冲突之中。斯丛狄周围的熟人和朋友几乎从未听到他提起纳粹时期的往事,但是他的文字和他的交友都透露出他的犹太背景。他在文字中抨击当时出现的反犹现象,读到一位报刊编辑写道:“不可以称一个在德国的犹太无赖为无赖,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吗?”他马上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反问:“该问的是,应该称一个无赖为犹太无赖,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吗?人们从来不提一个新教无赖或者一个日耳曼无赖。”<sup>②</sup> 他最关注的作家之一是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保尔·策兰(Paul Celan),一个一生都在用

① Gert Mattenklott, Peter Szondi-Bei Gelegenheit einer Ausgabe von Briefen.

② Andreas Isenschmid, Die “Ein-Satz-Enzyklopä die”. In: Die Zeit 27.05.2004.

文字触摸犹太人在二战中的悲惨经历的人，后来他成为保尔·策兰最重要的诠释者。他的朋友，如阿多诺等人更是大多为犹太背景。身为犹太人，他却选择德国作为自己的居住地，用他的话说他成了一个“自己选择的难民”(self displaced person)，这里当然也在暗示他自己过去的难民经历。<sup>①</sup> 他曾经表达过对巴黎的喜爱和对美国的向往，也曾于1968年去以色列担任过客座教授，虽然只呆了三个月，但是他已经感到这个国家将成为他内心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是他无法把它当作自己的家，因为如他自己所说，他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找到家的感觉。<sup>②</sup> 至于为什么要留在德国，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坦承“德语作为认识和表达的工具对我来说已经变得不可或缺”。<sup>③</sup> 德国对他来说是一个埋头工作的地方。他的同事曾认为他是个乐天随和的人，他却回答说，他每天从凌晨五点半到夜里十点都在工作！<sup>④</sup> 工作对他来说是抵御内心痛苦的方式，但是即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也无法使他摆脱内心的苦痛，从大学时代孤独寂寞就伴随着他，使他处于抑郁的状态，让他感受到生命中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绝望。1959年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生命的不可承受。<sup>⑤</sup> 1963年他曾经历了一次极其严重的心理危机，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苏黎世，接受心理治疗，直到次年才得以恢复。保尔·策兰在1967年给斯丛狄的信中曾鼓励他：“您千万不要失去信心，亲爱的彼得！从经验中我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有令人吃惊的抵抗力和工作干

① Peter Szondi, Briefe. p. 267.

② Ibid., p. 303.

③ Ibid., p. 248.

④ Ibid., p. 190.

⑤ Ibid., p. 81.

劲。”<sup>①</sup>可是这一绝望首先摧垮的是保尔·策兰,1970年4月20日他投塞纳河自尽。斯丛狄给赖希尔特打电话说“现在好了,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安宁”,随后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策兰的研究文章,可以看作是对老友的纪念。但是策兰之死在他的内心撕裂了一个伤口,他后来给赖希尔特打电话承认:“他离开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是想念他。”<sup>②</sup>

1971年7月,苏黎世大学聘请斯丛狄担任比较文学方向的教授,他自己也打算换个宁静的环境。8月他来到苏黎世,着手办公室和图书馆的规划,但是内心的伤痛和绝望最终还是将他压倒,同年10月18日他在柏林失踪,或许就是在当天投湖自杀,不过他的遗体是11月8日才在哈伦湖中发现的。

斯丛狄生前发表的著作不多,主要有《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论悲剧性》、《荷尔德林研究》、《策兰研究》和一些论文集,篇幅都在二百页上下。在他去世以后,他的一系列讲课手稿陆续被整理出版,这主要是得益于他详细的教案,这些手稿是《十八世纪的市民悲剧理论》、《诗学和历史哲学》第一和第二卷、《世纪末的诗意剧》和《文学阐释学导论》。这些手稿的发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当代文学理论变迁史上的地位。

要了解斯丛狄的学术贡献,必须要考察德国(这里主要指的是联邦德国)二战之后文学理论的变迁脉络。在纳粹德国时期,德国大学中德语语言文学专业是纳粹意识形态最严重的领域之一,许多知名的学者成为纳粹的热烈拥护者,认同纳粹观点的也不在少数。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学中并没有出现新老

① Peter Szondi, Briefe. p. 244.

② Klaus Reichert, Zum Bild Szondis.

更替的现象,一方面由于战争的原因年轻一代的学者或者在战争中死去,或者未能有机会完成教授资格论文,获得教授的职位;另一方面为了躲避纳粹迫害流亡出去的学者只有很少人重新回到德国,所以占领当局虽然在非纳粹化的过程中对一些有污点的教授颁布了禁止从事教职的命令,但是最终依旧不得不依靠现有的教授,所以即使是被禁止从事教职的教授大多数也很快重新走上了讲台。<sup>①</sup> 这些人选择的立场是远离政治,对纳粹历史保持沉默,既不抨击纳粹的罪行,也不反省自己和本学科的去,他们埋头于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之中,偏爱的题目大多是中世纪、德国古典文学和浪漫派,在研究中淡去对象的政治、历史和社会背景,文学研究的特点发生变化,更突出非政治性和主观性。<sup>②</sup> 直到50年代初,主要的文学研究方式一是回归永恒的宗教性价值,比如本诺·封·维泽(Benno von Wiese)的《德国悲剧史,从莱辛到黑贝尔》(1948);二是从民族特性和民族存在的学说转向以唯我论为特色的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艺术品的起源》(1949)一文是奠基之作;(三)重新拾起以艺术自律为特征的美学,将它视为圭臬,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Kaiser)的《语言的艺术作品》(1948)。<sup>③</sup>

进入50年代以后,这一以作品的内在分析为主的倾向仍然明显,文学研究基本上分成三个方向:一、人道主义的保守观以斯丛狄的导师埃米尔·施塔格尔和他的《评论的艺术》为代表,他们只关注经典作品,着力探究作品的思想、精神和美学的内涵,忽视文学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在方法论上反对分解式的分析,主

① Jost Hermand, *Geschichte der Germanistik*, Reinbek bei Hamburg 1994, p. 114. 关于战后德国文学理论的变迁过程主要参考此书。

② Ibid., pp. 114—115.

③ Ibid., p. 116.

张心灵式的体验,认为只有“感动人的作品才能被理解”;二、存在主义的阐释学追随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被遮蔽起来,只有在诗中才得到显现,在强调永恒和抽象的同时回避了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的内涵;三、结构主义的形式观以文学形式为中心,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描述各类文学体裁的发展史的著作,都是从纯形式的角度出发,采用解剖式的分析,但是这一派排斥任何文学的外部研究,所有不符合形式要求的都被视为二流,于是他们最后也走上了唯经典作品是从的道路,否认了文学的历史性。到了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新批评”派的出现,尤其是韦勒克的《文学理论》的影响日益增强,联邦德国的文学理论界的视野不再局限于经典作品,关注的焦点转向20世纪初的现代派文学,但是手法上还是强调“纯文学”的特点,形式分析居主导地位,仍然难脱非历史化的倾向。<sup>①</sup>

斯丛狄的戏剧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为基础,全面描述了从1880到1950年之间现代戏剧的危机、过渡和革新的过程。他的这一独特视角源自他对阿多诺和卢卡契的接受。<sup>②</sup>当40年代末存在主义哲学风行的时候,斯丛狄和他的好友伊万·纳格尔(Ivan Nagel)就注意到卢卡契青年时代和当时还不甚知名的阿多诺的理论著作。1947年秋,斯丛狄第一次回到布达佩斯时,给纳格尔带的礼物是刚刚出版的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1949年4月斯丛狄刚上大学一年级时又和纳格尔一起读了托马斯·曼刚刚完成的

<sup>①</sup> Jost Hermand, *Geschichte der Germanistik*, Reinbek bei Hamburg 1994, pp. 123-131.

<sup>②</sup> 关于斯丛狄对阿多诺和卢卡契的接受主要参考了 Christoph König, *Engführungen. Peter Szondi und die Literatur*. pp. 24-26.